

现代巴勒斯坦史

(第二版)

「以色列」艾兰·佩普◎著

译◎王健 秦颖 罗锐
校◎王健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现代巴勒斯坦史

(第二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巴勒斯坦史/(以)佩普著;王健,秦颖,罗锐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ISBN 978-7-208-09184-9

I. ①现… II. ①佩…②王…③秦…④罗…
III. ①巴勒斯坦-历史 IV. ①K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9548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陈楠

现代巴勒斯坦史

(第二版)

[以色列]艾兰·佩普 著

王健 秦颖 罗锐 译

王健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337,000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9184-9/K·1662

定价 36.00元

艾兰·佩普与以色列 “新历史学家”学派(译者序)

—

本书作者艾兰·佩普(Ilan Pappé)在以色列是位争议颇大的犹太历史学家,属于“新历史学家”学派(New Historians)的极左翼,后因公开号召对以色列学术界进行抵制而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威胁,并最终被迫辞去海法大学的教职,背井离乡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

艾兰·佩普 1954 年生于海法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于 20 世纪 30 年代逃离纳粹迫害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他 18 岁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1973 年赎罪日战争时正在戈兰高地服役。退役后,他于 1978 年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84 年获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阿拉伯历史学家艾伯特·豪瑞理(Albert Hourani)和罗杰·欧文(Roger Owen)。博士毕业论文后经修改出版,成为其第一部学术专著《英国和阿以冲突》。1984—2007 年,他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同时兼任海法埃米尔·多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2000—2008 年)。

从 1970 年底开始,以色列国内长期占据绝对主导的锡安主义^①意识形态因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对中东战争的反思而受到后锡安主义思潮的挑战。这种思潮在史学界、社会学界甚至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等艺术领域都有表现,其中,艾兰·佩普与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艾米·斯拉姆(Avi Shlaim)、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希勒·柯亨

^① 锡安主义(Zionism)一词原来中文中大多翻译为“犹太复国主义”,但这一译法只强调了“复国”这一方面,而没有反映出这个词的核心含义——“民族复兴”,因此本书中还是按其原意译为“锡安主义”。关于这个词的翻译问题,我国著名犹太学专家潘光教授在《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一书前言中有精辟论述:“就像一些外国人将我们的‘井冈山道路’译成‘武装斗争道路’,‘延安精神’译为‘艰苦奋斗精神’,实际上并没有全面理解这些词的本意,不如在翻译中保留原汁原味更好。”(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Hillel Cohen)^①等一批犹太历史学家形成了“新历史学家”学派,成为后锡安主义在史学界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以更为激进的论述成为其中的极左翼代表。他根据当时逐渐开始解密的英国和以色列政府相关文件,对1948年以色列产生及同年7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等历史进行了修正性的重新编纂,出版了许多专著,如《巴勒斯坦种族清洗》、《阿以冲突的形成:1947—1951》、《现代中东》、《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等,其中包括笔者翻译的这本《现代巴勒斯坦史》。

艾兰·佩普不仅在学术上主张要客观公正地阐释巴勒斯坦历史中阿拉伯人群体的历史情景,如认为驱逐并不如其他历史学家所言是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而是根据1947年由以色列未来领导人制定的所谓D计划组织的种族清洗,而且他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1999年,佩普作为极左翼以色列共产党为主的哈达什阵线代表参加了克奈塞特(议会)选举,始终坚持一个国家方案(即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国家和平共处),强调以色列在建国过程中由于忽视当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中东动荡局势,甚至指出锡安主义比伊斯兰激进组织更危险,呼吁全世界对以色列的经济、政治,包括学术界进行抵制。他相信对学术界的抵制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以色列的占领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大学教师协会要么选择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要么成为类似南非反对白人至上主义政权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以色列历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选择后者,将推动我们沿着唯一可行和非暴力道路向前,从迫在眉睫的大灾难中拯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②

佩普的历史著作和社会行动遭到了以色列主流历史学家、甚至“新历史学家”学派部分历史学家的批判,遭到了以色列右翼的不断攻击。历史学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认为佩普的著作为了突出和强化自己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论点而不惜虚构史实,以色列社会对他的攻击则认为他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这种攻击在2000年9月巴以冲突重新加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激烈。以色列克奈塞特议员多次对他加以谴责,教育部长呼吁海法大学将其解雇,他甚至还受到一些死亡威胁。

^① 本尼·莫里斯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中东研究系教授,艾米·斯拉姆系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汤姆·塞格夫系以色列历史学家、作者和记者,希勒·柯亨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② Ilan Pappé: Back the Boycott, *The Guardian*, 24 May 2005.

2007年,佩普在以色列海法大学校长,著名心理学家阿哈龙·本-茨维要求下主动提出了辞职。虽然本-茨维校长强调,佩普不应遭到孤立,因为这将有助于学术自由,但他还是希望佩普能自动离开。就在同一年,佩普创立了一年一度的以色列《回归法》会议,要求给予1948年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以无条件的回归权。

离开海法大学,佩普来到英国埃塞克特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从事20世纪民族政治研究。在接受卡塔尔一家报纸采访时,他谈了自己决定离开以色列的考虑,因为他发现由于其观点和信念不受欢迎,在那里越来越困难。“我在我的大学遭到抵制,校方一直试图赶我走。我每天受到威胁。我不仅被视为对以色列社会的威胁,而且我的人民认为我是个精神病人,我的观点文不对题。许多以色列人甚至相信我是为阿拉伯人工作的雇佣军。”^①

二

以色列历史编纂中的“新历史学家”学派的出现与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形成密切相关。

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国内一些民众,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更加理性地重新审视和反思阿以冲突问题,特别是积极寻找更加合理和可行的与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途径。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和中东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色列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动,特别是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启动,这股反思的社会思潮在以色列越来越强烈,最后汇聚标示为“后锡安主义”(Post-Zionism)。

其实,后锡安主义是一个交集着不同认知和立场的政治文化术语,总体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些观点和主张也还没有最终定型,但其共同点是对锡安主义核心信念的批判。在一批以色列人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知识精英看来,锡安主义已完成了在1948年建立现代以色列国的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其意识形态功能也应该就此结束,以色列应该形成一种公民身份,形成一种旨在适应自由民主普遍价值的制度框架,任何民族在实质上及制度上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问题。如以色列国确实是犹太民族

^① Mohammed Iqbal, Academic slams Israel for land grab, *The Peninsula On-line: Qatar's leading English Daily*, 29 March 2007.

安全住所吗？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地方能让犹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例如北美）？一个兼具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以色列国是否可行？以色列是否应该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是否以巴冲突完全是一场非黑即白的冲突？以色列是否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阿拉伯方面是否单独承担对冲突持续的责任？从而对以色列国家的现存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信以色列必须在民主性或犹太性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必须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以牺牲其他族群来强化犹太单一族群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后锡安主义”这个词也被右翼犹太人使用，按照对奥斯陆协定的立场来指称以色列左翼政治。

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以色列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传统锡安主义和极右翼的新锡安主义的谴责、抨击和攻讦。他们认为后锡安主义是一种“迦南主义”或“泛闪族主义”运动，越轨偏差，严重地超越了锡安主义界限。特别是后锡安主义将锡安主义运动视为一种殖民计划而非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这对以色列国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及存在合理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并削弱了犹太民族精神。他们还抨击后锡安主义有意歪曲历史去迎合反锡安主义思潮，有批评者就将后锡安主义者等同于旧的反锡安主义者。^①还有一些反对者不同意后锡安主义关于以色列“和平意愿”的增长取决于内部因素的判断，强调和平进程是外力强加的，犹太人仍然要以对所占领土的“以色列化”为己任。

在后锡安主义思潮中出现的“新历史学家”史学学派既从后锡安主义那里获得了灵感，并汲取了动力，又通过对大量解密文件和档案的深层研究所提出一系列批评性观点，对后锡安主义思潮提供了学术支撑。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对“新历史学家”学派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推动他们去努力从当今阿以冲突的现实文本去解读 1948 年战争及其后果，并解构和重构那段历史。

总的来说，“新历史学家”是一批对以色列历史，特别是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人逃离和阿拉伯国家和平意愿的传统假说提出实证挑战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旧历史学家无法将实证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为了意识形态的缘故对史料进行削足适履，从而忽视了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同时将研究的重心始终放在社会精英身上，从而忽视了草根民众。如

^① Shlomo Avineri, Post-Zionism doesn't exist, *Haaretz*, July 08, 2007.

本尼·莫里斯就指出：“旧史学家们作为成年人参与了1948年史诗般光荣的犹太国家的重生。他们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分离，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们写入史书的那些事实和进程。旧史学家们的写作大都依靠访谈和回忆录，最多使用了一些有选择的文献，其中许多被删剪了。”^①

虽然以色列没有正式的所谓官方史学，新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观点同一的学术群体。如在如何看待所谓的“D计划”的时，本尼·莫里斯等认为这是为了让新生的犹太国家免遭入侵的权宜之计；而艾兰·佩普等则将其视为企图占领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驱逐更多的巴勒斯坦人的预谋。但新历史学家通过大量新发掘和解密的政府文件、档案（主要是以色列的，阿拉伯方面的很难获得）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诸如锡安主义运动，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向，阿以冲突及和平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研究，提出了一些修正的史学阐释，力图还历史以真实。此外，以色列对国家历史的理解从70年代起也有所改变，其中的部分新观点也纳入了“新历史学家”学派的视野。

“新历史学家”与以色列主流历史编纂的差异，根据艾米·斯拉姆的归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主流观点认为英国试图阻止犹太国的建立，而“新历史学家”则表示英国试图阻止的是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第二，主流观点认为是巴勒斯坦人自愿逃离家乡，而“新历史学家”认为难民是被赶走或被驱逐的；第三，主流观点认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权力平衡有利于阿拉伯人，而“新历史学家”则指出，以色列无论在人力还是武器方面都占有优势；第四，主流观点认为，阿拉伯人有一个摧毁以色列的协作计划，而“新历史学家”则强调，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计划；第五，主流观点认为，阿拉伯人的不妥协阻碍了和平的实现，而“新历史学家”则认为以色列对和平困境应负主要责任。^②

“新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48年战争前后，特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的著作动摇了传统主流史学关于1948年战争前夕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处于灭绝危险的观点，指出当时碎片化的阿拉伯世界无法支持巴勒斯坦准武装力量赢得后委任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战争爆发

^① Benn y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Michigan, 2008, pp. 14—15.

^② Miron Rapaport, No Peaceful Solution, *Ha'arets Friday Supplement*, November 08, 2005.

时,巴勒斯坦准武装力量的人数、训练和作战能力都低于以色列部队。他们特别指出,犹太人能够在战争中获胜的原因是犹太代办处与外约旦哈希姆王朝达成了默契,作为承诺不进攻犹太国的回报,外约旦不发一枪地占据了西岸地区。此外,总体说来,锡安主义者成功地说服了大部分国际舆论,将锡安主义事业与大屠杀联系在了一起。“新历史学家”对1948年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自愿出走的神话和有关战后和平谈判问题也提出了挑战,认为许多巴勒斯坦人是被有计划地驱逐的,战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诚意进行和谈,但以色列不愿意妥协,甚至放弃了和平的机会。

“新历史学家”的这些观点受到了来自以色列传统主流历史学家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学者的批判。前者指责他们编造了锡安主义者的不当行为,而后者则指责他们粉饰锡安主义者的罪行。对“新历史学家”提出的最严肃的指责是他们忽视了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来源,使用了很少的阿拉伯史料,而且大多数参考引用的还是阿拉伯史料的英文译本。“新历史学家”与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家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历史学家为此进行了多场大论战。一些颇具知名度和拥有极高学术地位,并一直坚持远离“非学术问题”的主流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被卷入大论战中。这些知名专家教授虽不否认后锡安主义者所披露的“事实”与“发现”,但却质疑后锡安主义学者的“专业性”,攻击其研究理论与思想背景的“缺陷”。^①其中,本尼·莫里斯和艾米·斯拉姆与萨巴塔·特夫特(Shabtai Teveth)^②围绕其撰写的《大卫·本-古里安传》进行了争论;在《巴勒斯坦研究杂志》1991年秋季第1号上,本尼·莫里斯与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及努尔·马沙拉(Nur Masalha)^③展开辩论,后者指责本尼·莫里斯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的同时,构建了相对原来一些史著来说具有“中立性”的新神话,而他所举的证据不能支持他温和的结论,即阿拉伯难民问题产生于战争而非设计,而其证据则显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到了系统的和有预谋的驱逐。在回应中,本尼·莫里斯指责批评者陈旧的偏见和歧视,重申了他对阿拉伯人逃离的

① 王铁铮:《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西亚非洲》2006年第二期,第26页。

② 萨巴塔·特夫特系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

③ 诺曼·芬克尔斯坦系美国犹太学者、德国纳粹集中营犹太幸存者的后代。他提出“种族大屠杀产业(Holocaust Industry)”这一概念,即通过无穷无尽地反复渲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之外,从而制止世人对以色列压迫阿拉伯人劣行的任何批评。为此,美国德保罗大学2007年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迫使他黯然退出学术界。努尔·马沙拉系英国萨里大学阿拉伯裔宗教和政治学教授。

多方面解释的支持;本尼·莫里斯和艾米·斯拉姆与埃夫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①在《中东季刊》上也展开了争论,后者在1996年6月号上刊文,声称“新历史学家”系统地扭曲档案证据来按照他们自己制造的形象编造以色列的历史。艾米·斯拉姆则在同年9月号上为“新历史学家”作整体无罪辩护,并对锡安主义者与哈希姆王朝在1948年战争前的勾结做了进一步阐述。本尼·莫里斯刊文表示不值得回应,指责埃夫拉伊姆·卡什的文章是“曲解、半真半假和十足谎言的大杂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争论甚至还越出了学术界。1998年,海法大学学生泰迪·卡茨(Teddy Katz)在硕士论文中声称根据调查采访,以色列国防军第三旅在1948年战争期间在阿拉伯村庄坦图拉犯下了大屠杀罪行。为此,该旅的老兵起诉卡茨诽谤。在法庭听证时,卡茨表示要发表一份声明撤回自己的文章。后来他又表示不再撤回,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但最高法院拒绝干预。同时,海法大学宣称发现其论文有严重问题,包括文中的引用与卡茨的访谈记录不符,决定暂缓授予学位并要求他重新提交论文。由于艾兰·佩普等历史学家支持对坦图拉大屠杀的指控,因此这一问题迄今仍然是争论焦点之一。2001年,以色列教育部长利莫尔·利夫纳特认为以色列中学里使用的九年级历史教科书《变化的世界》具有后锡安主义性质,便断然发出禁令,并责成各学校将所有该书的副本都用碎纸机销毁。^②

“新历史学家”学派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对阿拉伯方面的史料很少进行挖掘(当然这有阿拉伯方面资料开放不足的原因),有些观点过于激进,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对历史审视与反思的宽度不够,过于集中于1948年战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对以色列历史的其他方面涉及不多,但是,他们毕竟结合最新解密的以色列政府和英国政府文件和档案,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历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研究,这不仅打破了以色列学术界的长期禁忌,扩展了以色列历史的讨论话题和公共话语,对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话语霸权”产生了冲击与挑战,而且激发了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官方的“历史即记忆”和有关历史与现状的主流历史编纂著作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与思考,从而必将对以色列未来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巴以关系的重新解读和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犹太正统派在以色列主流社会中仍

① 埃夫拉伊姆·卡什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犹太裔中东和地中海研究教授。

② Limor Livnat, “A World of Falsehood”, *Jerusalem Post*, 19 March, 2001, 8.

然占据主导地位，“新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与阿拉伯或亲阿拉伯的历史叙述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因此，“新历史学家”学派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处于边缘地位和尴尬处境，如著名东方主义学者萨伊德所言，充满“非常严重的，近乎精神分裂症的矛盾”。^①

三

艾兰·佩普的《现代巴勒斯坦史》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初版，2006年再版。再版增加了第八章《后锡安主义的繁荣时代》和第九章《自杀之路：奥斯陆协议寿终正寝与毁灭之路》，并将新后记《后阿拉法特及新沙龙时代》代替了初版后记《后奥斯陆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作为“新历史学家”学派的代表作，艾兰·佩普在此书的编纂中首先试图从叙述结构上加以突破，一改以往巴勒斯坦史存在的单一民族叙事主导倾向，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写出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共同交往发展形成的历史，通过对这段历史“双重民族主义化”，甚至“去民族主义化”来放松民族主义对历史编纂的钳制。他在导论中写道：“批判性地运用现代性概念，就有可能不带歧视地解构两种叙事，……需要应对、甚至要推倒的障碍正是深深植根于多数民众心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国家历史。目前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历史编纂学，在双方不同的教科书中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自然有更好的叙述。现在这两种历史观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有时就会因其自负、种族中心论和精英论调受到排斥与批评，有时在民族史诗篇章得到尊重的同时，其中的荒诞也会遭到奚落。”^②

在以往的阿以双方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中，绝大部分是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委任统治作为将这一地区历史分流的起点，并划分成巴勒斯坦人和锡安主义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至于1948年之后的历史，除了在阿以冲突的特定章节里把这两个民族历史当作同一主题来进行论述外，同时叙述这一土地上两个民族平行发展历史的书籍屈指可数。这种单一民族主导的叙事模式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缺失，更多地受到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约束，这里存在着民族主义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学发展之间的纠缠与叠覆。双方的民族主义史学著作都

^①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London, 2003, 8

^②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2。

假定这片土地的历史等同于其民族的历史,他们对土地和民族并不作区分,土地和民族同为一体并在同一历史中具有同一本质。正如佩普所指出的:“民族叙事隐匿之手书写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土地的历史。……由于以色列史学家与西方人有着更密切的认同感,对他们来说有幸的是,其民族历史编纂直至最近一直更被尊为学术研究,更加忠于‘史实’而非意识形态。相形之下,巴勒斯坦研究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的著作也遵守同样的西方学术规范,但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又缺乏合适的学术机构,因此通常被当作宣传人员。不过,这种学术评价方式最近已被颠覆:这一改变不仅归因于人文科学中所发生的转变,也归因于政治。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该地区的历史一直分为要么亲以,要么亲巴。历史学家或许希望做到中立客观,但他们事实上属于冲突双方中的一方,或者对其中一方有着强烈的认同感。”^①

因此,要完成这一似乎不可能的学术使命,遇到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是寻求最大可能的客观公正,仍然无法逃脱来自传统历史学家的抨击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虽然约翰·理查德·皮尔格(John Richard Pilger)、瓦立德·卡利迪(Walid Khalidi)、理查德·安德森·福尔克(Richard Anderson Falk)、埃拉·哈比巴·索赫特(Ella Habiba Shohat)^②、努尔·马沙拉等予以充分肯定,但埃夫拉伊姆·卡什在《中东季刊》评论该书时,开头就将艾兰·佩普说成是“所谓‘新历史学家’中古怪的人。与他的那些以最新解密的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和以色列独立初期的文件为基础撰写反以色列文章的同事不同,佩普是一个不知羞耻的‘相对论’者,他的史学研究不顾事实地对政治态度和议程作反向推测”。^③即使在“新历史学家”学派内部,本尼·莫里斯也提出了批评,指出书中有许多史实是完全虚构的,错误百出。“每页上的错误是佩普历史方法论与政治倾向相结合的产物。”^④

其次,佩普在此书中力求改变以往史著中以现代化发展这一单向线形

①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6—7。

② 约翰·理查德·皮尔格系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瓦立德·卡利迪系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裔历史学家,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担任研究员。理查德·安德森·福尔克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终身教授。埃拉·哈比巴·索赫特系以色列犹太作家、活动家、演说家和美国纽约大学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教授。

③ Efraim Karsh, “Review on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6, p. 82.

④ Benny Morr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The New Republic Online*, March 22, 2004. <http://www.ce.bgu.ac.il/~censor/katz-directory/04-03-22benny-morris-The%20New%20Republic-1.pdf>.

历史演进模式来套用阐释巴勒斯坦的近现代历史进程的研究范式,更加注重“过去”的延续性。他指出:“这一叙事展现了从原始状态到现代巴勒斯坦的现代化线性历史。锡安主义者的叙事中,锡安主义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而在巴勒斯坦人的叙事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则是现代性的信使和结果。这种冲突大多被视为相互冲突的两种现代化逻辑所导致的产物,既不可避免,又是暂时的,不甚重要的,必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完成而结束。”^①同时认为:“现代化理论假定历史中存在着社会传统中断、过去生活方式停止的明确时刻,就本书而言,这个时刻是1799年。依照这种观点,巴勒斯坦在西方帮助下告别了过去。经过欧洲的神奇点拨,巴勒斯坦迎来了启蒙和进步。但是如同其他西方化的例子一样,所带来的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仍无定论。”^②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披着传统和宗教外衣的“过去”往往被描绘成西方带给巴勒斯坦进步时所遇到的障碍。它的存在很好地解释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部分地区现代化遇阻或中断的原因。这种带有负面干扰因素的“过去”普遍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或巴勒斯坦人中,而在以色列或犹太人方面较少,主要是那些来自阿拉伯国家,而非来自西方国家的犹太人生活特征。此外,“过去”对妇女、农民和工人的影响要比对男人、地主和雇主的影响更为强烈。在本书中,佩普希望重新引入“过去”这一概念,并说明它曾是,并仍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过去”并不非总是意味着倒退,而“现在”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进步。与中东其他地方一样,在巴勒斯坦,“过去”曾有今天业已消失的平等主义行为模式。同样,与西方的接触并非总能改善妇女地位或削弱家族权力。事实上,尽管殖民主义、锡安主义以及后来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带来了剧烈的政治变化,基本社会关系却得以维持原状,这充分证明了“过去”还是具有适应性和恢复力的。

正因如此,本书并没有将世俗化描述成与西方接触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书中的宗教也表现出了灵活性,它成功地适应了技术甚至政治变革的世界。传统也不再是阻止实现“现代化”的最后障碍,而是那些在变动现实混乱中茫然失措者的防卫和适应机制。宗教和传统成为了影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强大力量,并且保持了下去。佩普指出:“过去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也影响到我们对变化的理解。书中的变化是非线性的,而且也绝不是协调的。与

①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5。

② 同上,边码5—6。

西方遭遇强化了传统行为方式,同时又打破了传统模式。对一些人来说,变化很快,对另一些人来说,变化是温和的,其余的人则几乎感觉不到变化。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延续’,甚至‘变化’等术语。”^①

第三,佩普在此书的写作对象方面,努力改变以往史著中占主导地位的高政治、“精英”人物标准模式,有意识地将目光向下,关注庶民和底层社会。其实,这种“庶民历史”写作模式在本书出版之前已逐渐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例如,亚历山大·舒尔赫(Alexander Scholch)的《变化中的巴勒斯坦 1856—1882: 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研究》、巴鲁克·齐默琳(Baruch Kimmerling)和乔尔·密格达尔(Joel Migdal)的《人民的形成》及其沙米·法尔松(Samih Farsoun)和克里斯蒂娜·扎卡里亚(Christina Zakaria)的《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等都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活生生的人从人文学科角度进行了剖析与理解。但佩普较之他们更为大胆的努力是不仅从底层社会的“庶民”,而且改变了以往单一民族视角,从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的“庶民”角度来进行历史叙事。^②佩普认为:“现代巴勒斯坦/以色列历史应该是底层社会和精英集团共同的历史,是期待改变和安于现状的人的历史,是关于外部和内部变化动力的历史。这一历史寻求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入侵者和被入侵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叙事结合起来。它的主题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众,以及他们从各自熟悉的生活模式中脱离出来的历史起点;而这些历史起点集合起来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块土地现代历史的开端。”^③

佩普关注底层社会是与前面谈到的其“去现代化”模式努力相一致的,正是在“去现代化”的历史叙事中,一个新的重要角色,即底层社会出现了,它指的是通常生活在政治和权力域外,同时在生活的某些而非全部方面愿意依赖政府和精英的阶层。在现代化主义者看来,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巴勒斯坦当地人,底层社会在现代化之前并不是有效主题,而巴勒斯坦地区的精英们碰巧成功地西化,这就使巴勒斯坦现代化的叙事更像精英们的历史,而非“一个民族”的历史。精英们留下了有关他们的成文史据,帮助历史学家们将精英历史当作巴勒斯坦的历史进行了重构。换言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传统历史是一种从政治档案中推导出来的精英历史。而佩普努力将那

①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 10。

② Rashid Khalidi, “Review on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5, No. 1 (Autumn, 2005), pp. 107—108.

③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 12。

些在现代化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中缺失或完全边缘化的角色，如妇女、儿童、农民、工人等引入了历史舞台。

第四，佩普在书中提出或采纳了一些“新历史学家”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以往主流传统历史学派中是不存在的，甚至被认为是反锡安主义的，或者是反以色列的。虽然有些观点不是佩普首先提出的，但他在书中予以了强化，甚至以一些未被世人所公认或接受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加以佐证。这也是他遭到以色列主流史学家，甚至“新历史学家”同行攻击和诟病的原因所在。

例如，佩普在书中将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地区开展的民族复兴运动等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指出：“没有什么能与锡安主义者带来的殖民主义力量相比，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已经十分明显。虽然人数不多，但事后来看那是殖民移民。由于巴勒斯坦没有被某个欧洲列强占领，因此不是真正的殖民。但是像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一样，这也是一种欧洲运动，是欧洲人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当地的利益进入巴勒斯坦的运动。殖民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当地人看作可以利用的商品或资产，或是要铲除的障碍。”^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锡安主义一直是个民族情感激昂的殖民计划。”^②

又如，许多学者都已承认 1948 年战争前后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难民的驱逐行动，但一般都认为是战时的权益之计，但佩普认为这些行动是早有预谋的系统性计划，甚至在这些行动中存在对巴勒斯坦居民的大屠杀行为和种族清洗行径。他在书中写道：“D 计划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尽可能清除未来犹太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拥有几个旅兵力的哈加纳，每个旅都接到要占领的村庄名单，其中多数村子注定要遭毁灭，下令保持完整的村庄只是个别。……5 月中旬英国人离开时，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被驱赶。种族迫迁早期英国负责维护巴勒斯坦法律和秩序。1948 年 1 月，第一波迫使 7 万名巴勒斯坦社会经济精英逃离，也加速了巴勒斯坦人口的减少。城区精英的离开诠释了战争早期阿犹混居区和西耶路撒冷的驱赶政策如此奏效的原因。”^③特别是他为了向读者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以编年方式集中扼要介绍了 370 个被以色列消灭的村庄中的 64 个村庄的情况，以便于更清楚地认识当时几乎完全消失的巴勒斯坦乡村的基本情况。

①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 41—42。

② 同上，边码 52。

③ 同上，边码 129—130。

由于佩普力图凭借一己之力在书中完成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上至精英下至庶民的宏大历史叙事,任务的艰巨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要求作者不仅熟悉两个民族的语言、史料和基本史实,而且还要深刻理解犹太人、锡安主义、以色列、伊斯兰、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因此,每个专业领域中的专家肯定能在这一宏大历史叙事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误,特别是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的学者由于价值立场的不同,对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存在不同看法也在情理之中。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否定本书的基本价值,即一种试图用全新视角来理解和重构一段熟悉历史的努力,也就是作者本人在书中所言:“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而言,更多围绕的是民族内部冲突的历史,这一冲突成了该地区历史和巴以历史的本质。那么,这一历史能否以其他方式加以重构呢?对此,我在书中尝试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我希望能在不将西方、政治精英、民族主义和民族内部冲突的重要性边缘化,也在不忽略现代化理论家所记载的某些主要变化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从事这项研究。这些进程包括了我称之为与西方接触后‘非西方社会’所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卫生化、世俗化、集权化和政治化等诸多发展。”^①

四

尽管中国的犹太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起步,但其发展却屡屡遭挫,特别是受到数十年战乱、极左思潮和十年“文革”的冲击。因此,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时段看,中国犹太研究真正获得大发展和达到空前繁荣是在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对于犹太/以色列通史研究而言,除了中国学者写的几本专著,如潘光、余建华和王健的《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徐向群、余崇健的《第三圣殿——以色列的崛起》、肖宪的《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张倩红的《以色列史》、孙正达、张暄、蒋加明的《以色列国》、徐焕忱的《以色列百年风云(上、下)》等,还将国外,特别是以色列学者撰写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通史专著,如阿巴·埃班的《犹太史》、丹·巴哈特、拉姆·本-沙洛姆的《以色列3000年》、哈伊姆·格瓦蒂的《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诺亚·卢卡斯的《以色列现代史》等翻译介绍到国内,对中国学术界和广大民众了解和认识犹太民族、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①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7。

但是,在翻译介绍国外有关巴勒斯坦/以色列通史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大多介绍以色列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和观点,这当然是需要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但如果对阿拉伯学者和以色列非主流历史学家,如“新历史学家”学派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全然忽视,不做介绍,这同样也不利于中国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全面理解和认识巴勒斯坦/以色列史。

2001—2002年我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在选修以色列史和以色列政治社会专题研究时,发现以色列历史中存在着一些悖论。如在强调犹太性,忽视巴勒斯坦人权益的情况下,以色列还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又如在犹太正统派干预以色列政治和社会的情况下,以色列还算不算一个世俗国家。对于我的这些疑惑,课堂上的老师总是以以色列“例外论”加以解说。期间,我接触到了一些观点犀利,带有强烈批判性的“新历史学家”学派学者的论著,如本尼·莫里斯的《正义的牺牲品:锡安主义者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史 1881—2001》等,使我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史的认知视角更加多维,也觉得很有必要将“新历史学家”学派的著作和观点介绍到中国。

艾兰·佩普的《现代巴勒斯坦史》2004年出版后,即在以色列和国际上有关中东研究的学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争议。2006年增改后再版。2007年,我开始在以色列史硕士课程中介绍此书及其观点,作为对原来以主流历史学家观点为核心的教学内容的补充。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请我翻译此书,虽然行政、研究和教学任务非常繁重,但我考虑到此书对国内学术界和广大民众更加全面而充分地理解巴勒斯坦/以色列史不无裨益,欣然应允承担。但必须指出的是,翻译介绍艾兰·佩普的这本专著绝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他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我对他在书中的许多叙述和论断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我不同意他将锡安主义看作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而更多地将锡安主义视为特殊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个没有国土家园的复兴运动,必然要获取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由于它长期处在反犹运动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包围摧残之下,因此对自身的安全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意识,常会不由自主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去打击对自生的威胁。又如,在有关1948年战争所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上,我觉得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实存在艾兰·佩普所说的驱逐行为和可能的驱逐计划。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战时阿拉伯领导人的呼吁,惧怕战争或因对未来在犹太人管理下生活的不确定性而逃离也是巴勒斯坦难民